

构建海湾新安全体系

——由内贾德访问伊拉克谈起

蒋 真

内容提要 作为中东和海湾的地区大国，两伊接触蕴含着有关安全主体在关键利益上的角逐，意味着海湾安全格局出现新因素。从传统的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三角制衡到伊拉克战争后的四方角逐，海湾安全建构中的大国因素一直起主导作用。伊拉克战争后，美国试图建立新伊拉克以取代萨达姆政权努力的失败，使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安全构建中从幕后走向前台。当前，海湾显现的竞争与妥协并存的安全格局已将构建海湾安全体系的主要因素摆上了台面。但要建立这种安全体系仍将面临许多困难和不确定因素，其中包括美国和伊朗关系、伊拉克重建及相关稳定问题、地区信任问题，以及美国未来对中东的政策。

关键词 伊朗 伊拉克 内贾德 三角制衡 四方角逐 大国因素

作者简介 蒋真，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西安 710069）。

2008年3月2日，伊朗总统内贾德对伊拉克进行了为期两天的高调访问，内贾德是两伊战争以来首位访问伊拉克的伊朗总统。因正值联合国安理会酝酿对伊朗的第三次制裁、美国对中东政策面临改朝换代的更迭、伊拉克内乱持续升温之际，因而此次访问格外引人注目，尤其外界对访问可能引起的两伊关系变动、美国和伊朗关系的突破，以及对中东地区安全格局的影响等产生多种猜测。事实上，此次访问是2003年萨达姆倒台后两伊逐步接触的延续，是伊朗为应对核危机在国际政治外交舞台周旋的一个插曲。两伊作为中东和海湾地区的大国，两国关系对地区安全和稳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虽然当前海湾安全形势并不明朗，但两伊接触蕴含着海湾安全格局的新因素，展现了有关安全主体在关键利益上的角逐，竞争与妥协的安全态势在一定程度上为构建新的海湾安全体系提供了前景。

两伊关系改善的寓意

从两伊战争到海湾战争，两伊关系从对立逐步走向和解，尤其是伊拉克战争后，两国关系出现转暖趋势，高层互访频繁。2008年3月伊朗总统内贾德访问伊拉克，既是两国关系升温的延续，也是伊朗围绕核问题展开魅力外交的一部分。

内贾德在访问伊拉克期间，会见了伊拉克总统塔拉巴尼、总理马利基，还拜见了什叶派宗教领袖西斯塔尼。两国签署了7项协议，内容涉及保险、海关、工业、教育和交通。作为回报，塔拉巴尼表示，伊拉克政府将寻求驱逐以伊拉克为基地的伊朗反政府组织“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对于这次访问，双方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塔拉巴尼称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访问。马利基表示，两伊关系紧张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总统的到访表明了加强两国关系和增进共同利益的强烈愿望。内贾德则说，他的访问翻开了两国关系的新篇章，“一个团结、强大和繁荣的伊拉克符合本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

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希望通过这次访问,强化什叶派纽带,全面打造两伊新关系,在化敌为友的同时,努力实现与伊拉克的“捆绑”,从而改善其安全环境,并提高伊朗在中东的地缘政治地位。¹

然而两伊和解远非两国关系问题。首先,美国在整个中东地区拥有政治主导权,而目前的伊拉克驻有众多美军,撇开美国对中东的政策来谈两伊政治是不切实际的。其次,伊朗目前面临核问题困局和美国步步紧逼,安理会新的制裁即将出台,伊朗总统进入美国驻守的地盘发展两伊关系,自然也绕不过美伊(朗)关系。最后,中东其他国家对美国态度的怀疑和对两伊关系变化的观望,也是中东形势未来发展的不确定因素。两伊接触意味着中东局势和海湾安全开始出现新的因素。

(一) 两伊和解背后的美国因素

对于内贾德访问伊拉克,美国方面虽未做出直接评论,但表现出一种微妙的“谨慎乐观”。在公布出访消息的同一天,美国国务卿赖斯在达沃斯论坛上表示,美国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与伊朗的分歧。赖斯指出:“由于伊朗停止了核活动,美国准备与伊朗直接对话。美国并不想将伊朗视为永久敌人。”白宫发言人佩里诺于2008年2月14日表示,美国支持两伊发展良好关系,同时也呼吁伊朗停止支持那些向伊拉克平民和驻伊美军发动袭击的极端分子。^④事实上,伊朗一直将在伊拉克的影响优势作为与美国较量的筹码,不会轻易实施报复。正如2005年伊拉克伊斯兰最高安全委员会领导人称,“如果伊朗想在伊拉克攻击美国,对美国人来讲那将是地狱,他们可以派遣几千名自杀式爆炸袭击者,但一个都不会是来自伊朗”^⑤。虽然目前美伊关系非常微妙,美国指责伊朗插足伊拉克事务,向伊拉克反美武装提供武器和训练,伊朗则坚决要求美国撤出伊拉克,但在伊拉克稳定问题上,双方已经进行了3轮会谈,会谈级别已提升到大使级。伊拉克是美国和伊朗政治较量的战场,也是寻找共同利益、缓和紧张关系的场所。因而,两伊接触在一定程度上是三方关系,而不仅仅是双边关系。

(二) 伊朗的动机

伊朗总统内贾德访问伊拉克之所以引人关注,一是伊朗正面临核问题困扰,外界对伊朗如何应对即将来临的第三次制裁非常关注;二是伊朗在伊拉克的政治影响力,以及如何运用这种政治优势也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分析人士指出,内贾德高调访问伊拉克,并在出访前提前公布行程,与美国领导人对伊拉克突击式访问形成鲜明对比,旨在向美国显示伊朗在解决伊拉克问题上的重要性,从而加重在核问题上与美国抗衡的砝码。此外,伊朗也有缓和与周边国家关系的需求。20世纪80年代末霍梅尼去世后,伊朗已经开始缓和与其他中东国家尤其是海湾国家的关系。激进派总统内贾德上台后,这种趋势也一直是伊朗外交的主流。2007年12月,海湾合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海合会”)成员国邀请伊朗总统参加它们在多哈举行的年度会议。沙特国王阿卜杜拉邀请内贾德参加朝觐。伊朗与埃及在1980年断交后,27年来首次开始探讨重新复交,以及在开罗重开大使馆的可能性。

(三) 伊拉克政治独立性的作用

2003年萨达姆政府倒台后,伊拉克的战后重建一直受到派别斗争和爆炸袭击事件的严重影响。新的伊拉克政府无权威性,美国当局存在的“合法性”一直受到谴责,伊拉克很难被看做一个独立的地区政治实体。但正是因为伊拉克近来陷入分裂局面,伊拉克政治进程本身并不完全以美国的意志为转移,因而它作为地区政治的参与者,有关方面对美国的作用更应当进行多角度分析。例如,在美国对伊朗核问题态度强硬时,伊拉克外长兹巴里在2006年对到访的伊朗外长表示,他反对伊拉克的邻国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支持伊朗寻求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⑥美国与伊拉克各个派别和势力之

¹ 参见冯武勇:《伊朗总统30年首次踏入伊拉克》<http://news.eastday.com/w/20080303/u1a3438796.html> 2008年3月3日。

^④ 参见人民网:《内贾德将首次访问伊拉克,美国方面态度微妙》, <http://world.people.com.cn/GB/1029/42361/6903358.html> 2008年2月20日。

^⑤ Henner Furtig,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in the Persian Gulf: the Interregional Order and US Policy”,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61 No. 4, Fall 2007, p. 634.

^⑥ See Kenneth Katzman, “Iran’s Activities and Influence in Iraq”,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October 12, 2007.

间的政治分歧，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撑着伊拉克作为一个新政治因素影响中东政治。尽管这种因素是混乱的、不确定的，但也使构建新地区安全体系显得更为紧迫。

内贾德此次访问伊拉克并不能表示两伊关系出现了质变，但访问本身是有深层意味的，不仅包括伊朗改善地区关系的努力，以及在解决伊拉克问题上的积极性，也含有美国对地区问题的新认识。由于伊朗和伊拉克问题与中东和海湾地区的许多安全问题联系在一起，因而，两国接触不仅有助于伊拉克的稳定，也预示着海湾地区安全格局将出现新局面。

传统安全与三角制衡

海湾地区安全格局始终带有浓厚的人为因素，从英国殖民统治到美国一家独霸，该地区安全局势始终笼罩在“霸权稳定论”的理论主导之下，因而我们应认识到，在论述海湾地区安全时并不仅指海湾沿岸国家，美国因素也是安全建构的主要对象和主导因素。中东地区政治文化的独立性和独特性也增加了实现地区安全的难度。与此同时，由于海湾地区国家之间存在复杂的种族、宗教、领土等纠纷，2003年伊拉克萨达姆政权被推翻之前，该地区的安全格局一直以传统的军事安全为主要内容，以三角均势为主要形式。其主要参与者是伊朗、伊拉克和以沙特为首的海合会，代表性事件是两伊战争和海湾战争。尽管海湾地区安全格局是以三角均势为主要形式，但其内部组合时常变换，主要分为3个阶段，伊朗和沙特抗衡伊拉克时期（1972~1980年）、伊拉克和沙特对抗伊朗时期（1980~1990年），以及伊朗和沙特及海合会成员国再次联合抗衡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时期（1990~2003年）。

20世纪60年代末，英国势力宣布退出海湾，美国积极谋求填补权力真空。但美国由于在越南战场上受挫，全球扩张负担过重，决定实行海外收缩战略，推出“尼克松主义”，主张对美国安全利益至关重要的地区提供经济、军事援助，在威胁较小的情况下由这些国家自己承担防务，这种“代理人战略”使美国急需在海湾地区扶植新的代理国，以便与苏伊（拉克）对抗。伊朗和沙特则成为当时美国“两根支柱政策”的中坚。由于在反对苏联社会主义中的地缘政治优势，伊朗成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反苏前线，因此70年代是美伊关系最为密切的一段时间，美国利用伊朗作为反苏前沿，伊朗凭借美国的支持与武装以波斯霸主自居。在美苏冷战的背景下，海湾安全格局主要是亲美的沙特和伊朗对抗亲苏的阿拉伯复兴社会主义政权伊拉克。

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推翻了亲美的巴列维王朝，美国的“两根支柱政策”破产，海湾地区的安全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伊朗伊斯兰政权在外交政策上宣称“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并积极向外输出伊朗式的伊斯兰革命，在中东引起恐慌。伊朗、沙特抗衡伊拉克的安全模式开始转为沙特、伊拉克对抗伊朗什叶派政权。这种安全模式的重组有自觉因素，如伊拉克和沙特都是逊尼派主政，而伊朗输出的革命是什叶派的治国理念。随后，萨达姆打着维护逊尼派国家利益的旗号，以两伊边界纠纷为由发动了两伊战争。而事实上，两伊战争是关于领土、影响力和生存的斗争。这场战争对伊朗的政策产生了极大影响。对于战争中伊拉克对伊朗的生化武器攻击和国际社会的冷漠态度，20世纪90年代初，时任伊朗总统拉夫桑贾尼表示：“生化武器是穷人的原子弹，也很容易制造。我们至少应考虑用它来加强国防。尽管使用这些武器是不人道的，但战争教我们认识到国际法庭仅是一纸空言”^④。也正是在两伊战争后不久，伊朗重启中断多年的核计划。这种安全模式背后的大国因素仍是该阶段海湾安全的主要特征之一。例如在持续8年的两伊战争中，美国在两伊之间时而支持伊拉克，时而支持伊朗，在两国断绝关系的情况下向伊朗出售武器，导致发生伊朗门事件。

¹ See Anoushiravan Ehteshami, “Iran-Iraq Relations after Saddam”,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Autumn 2003, p. 117.

^④ Anthony H. Cordesman, “Threats and Non-Threats from Iran”, in Jamal S. Al-Suwaidi ed., *Iran and the Gulf: A Search for Stability*, the Emirates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and Research, 1996, p. 276.

如果说在前两个阶段,海湾的安全组合还有基于各国国家利益的合理性和必然性的考虑,那么,海湾战争后,该地区安全局势的人为因素则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1991年,美国势力全面进入中东,海湾安全格局完全被纳入到美国对中东的战略中,服务于美国的中东利益。战争结束后,美国对海湾地区的安全安排进行了新调整。鉴于一个脆弱但完整的伊拉克对伊朗的制衡意义,美国保留了萨达姆政权。与此同时,美国通过与海湾国家签订一系列联盟条约和建立军事基地,加强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存在,通过建立“GCC+2”(海合会+埃及、叙利亚)的安全模式,构建起美国以地区盟国为主体的海湾安全体系。而两伊被排除在海湾安全体系之外。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对两伊的遏制战略一直是美国对中东政策的重要内容。在这一阶段,由于对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侵略野心的恐惧,沙特与伊朗的关系较亲近。尤其是在90年代,伊朗拉夫桑贾尼的务实外交逐步缓和了与海湾国家的关系,1991年3月,伊朗和沙特也恢复了外交关系。但沙特等海湾国家对伊朗仍保持一定的防范态度。

然而,海湾地区这种传统的三角制衡模式有许多弊端,这也是该地区冲突不断的重要原因。(1)大国势力介入及其主导作用使这种安全模式不具备合法性,加剧了中东国家内部政治的变动,增加了地区冲突的可能性,使国家间的安全组合过于频繁。(2)这种三角制衡模式并没有解决海湾地区复杂的宗教、种族、边界等冲突,因而安全构建具有不稳定性。如两伊间的边界纠纷、伊朗与海合会成员国之间的领土纷争,伊朗作为什叶派、波斯民族与海湾其他逊尼派、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认同差异等。正因为如此,这种三角制衡模式的组合方式不停地变换,地区冲突也不断发生。(3)这种安全模式更多是建立在对抗的基础上,没有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使该地区国家对共同利益和集体认同感不足,因而很难实现真正的安全。

伊拉克战争与四方角逐

尽管海湾地区安全格局受到美国因素的主导,但并不完全以美国意志为转移。2001年,美国本土受到袭击,美国对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进行了重新定位,反恐战争成为美国对中东政策的重要内容。但美国试图将伊拉克建成中东民主的模板,将中东一劳永逸地带入现代民主社会的愿望并未实现,反而由于伊拉克各种势力的混战和斗争,使当前海湾地区安全状况更加复杂。美国建立新伊拉克取代萨达姆政权努力的失败,使美国在该地区安全构建中的角色由幕后走向前台,海湾安全体系中原有的三角制衡变成了四方角逐。

当前,海湾地区的安全主体主要包括美国、伊朗、伊拉克和以沙特为首的海合会四方。它们能够在该地区形成四方角逐的形势来自于它们都有各自的安全主张和利益。伊朗对海湾地区的安全主张非常鲜明:(1)伊朗认为,无论从人口、面积、资源、政治体制的民主化等方面看,伊朗都有理由在中东保持相当的地位,伊朗在海湾的主导地位是它天然的权利,有合法性基础。因而,任何有效的安全安排必须包括伊朗。(2)伊朗反对外来势力干涉海湾地区安全事务,尤其是反对美国在中东和海湾地区的存在,以及将地区问题国际化。它认为,海湾安全应由海湾沿岸国家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对于“GCC+2”模式中埃及和叙利亚加入海湾安全安排,伊朗认为,两国“应当致力于保卫穆斯林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权利,而不应干涉在地理上遥远海湾事务”¹。(3)伊朗的地区安全观还表现在反对打破地区力量的平衡。尤其是反对美国单独提升沙特的地位。(4)作为非阿拉伯国家,伊朗主张双边主义,反对在海湾建立“阿拉伯安全俱乐部”。

美国在海湾地区安全的首要目标是保证“海湾石油自由出入,并以稳定的价格输送到国际市场”。而要实现这一目标,美国首先要把两伊作为在中东的重要防范对象。其次,要防范地区大国的

¹ Anwar Gargash, “Iran, the GCC States, and the UAE: Prospects and Challenges in the coming Decade”, in Jamal S. Al-Suwaidi ed., op. cit., p. 144.

野心，就需要保证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绝对主导权。最后，美国对海湾盟国也心怀疑虑，敦促盟国内部改革和平息反美情绪也成为美国的安全目标之一。

对于沙特等海合会成员国来讲，由于自身力量有限，与美国结盟是它们安全政策的首选，其次是加强海合会内部的联合，加强防范能力。然而，这种政策随着地区局势的发展也在发生变化，尤其是伊拉克战争后，美国打掉塔利班和萨达姆政权——伊朗的两个夙敌，使伊朗的地位得到显著提升。围绕伊拉克稳定问题，美国和伊朗之间也开始了直接接触。而且 2007 年底，美国情报评估报告指出，伊朗自 2003 年起就中断了核武器计划。这些因素使美国的海湾盟国怀疑美国正在与伊朗寻求和解。尽管布什在 2008 年初访问中东时一再表示：“出访的部分原因是向该地区各国表明，我们将伊朗视为一种威胁，国家情报评估报告绝没有降低而是阐明了这种威胁的严重程度。”¹ 但其海湾盟国依然疑虑重重，因为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在与伊朗断绝关系的情况下还向在跟伊拉克开战的伊朗提供武器。与此同时，海合会内部在安全观上也一直存有分歧，主要是南北方成员国对防范两伊的优先性尚有争论。

当前的伊拉克虽然仍以美国占领当局为主，中央政权不具有权威，但它仍然是海湾安全格局的主体之一。2003 年后，两伊关系的升温，不管有无美国的默许或暗中支持，伊拉克的不统一和不稳定性在一定程度上使该国在海湾安全中具有不以美国意志为转移的独立性。满足国内各派的安全利益，寻求国家和解，既是伊拉克稳定的主要内容，也是构建海湾安全体系的重要因素。

正是由于四方都有自身的安全观念和安全需求，才形成了海湾竞争与妥协交融的四方角逐态势。美国、伊朗、沙特、伊拉克等两两关系都在这种态势中出现新变化。美国想借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之机加强在中亚和中东地区的存在，形成对伊朗等地区大国的包围态势，却在伊拉克问题上深陷不出。因而，美国在对伊朗政策上左右为难，一边在核问题上咄咄逼人，一边又在伊拉克问题上与伊朗进行前所未有的接触。美伊一方面举行大使级会谈，同时又在霍尔木兹海峡军事对峙。而伊朗方面在国内对美国政策争论的推动下，也表现出前后不一的矛盾举措。它既想与美国寻求和解，又害怕与美国妥协的结果使伊朗本国的安全形势更加恶化；既想寻求在海湾的大国地位，又不能不接受美国在中东地区存在的现实。对沙特而言，美国在伊拉克实践西方民主政治和提升什叶派地位的做法，使沙特国内政治面临改革压力，家族政治受到挑战。伊朗和沙特之间尽管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一直在寻求和解，但伊朗仍然是沙特的重点防范对象。伊拉克战争后，伊朗在本地区的影响力上升，两伊关系在缓和的同时也有竞争。而在目前的伊拉克，领导集团多元化和派别之间利益斗争导致伊拉克与外界联系的复杂性，伊朗和美国在伊拉克的较量也为派别斗争提供了更多的政策选择空间。

海湾新安全体系的前景

美国自入主中东以来，一直在寻求建立稳定的中东和海湾安全体系，但始终未能实现该地区的真正稳定。2003 年伊拉克战争是美国重组中东和海湾安全体系的重要契机，但进程并不顺利。面对当前混乱的海湾安全局势，美国政界和学术界纷纷出谋划策，提出各种安全方案，旨在最大限度地确保美国在该地区的安全利益。

在伊拉克战争后不久，美国的智囊机构兰德公司便提出了建立海湾新安全体系的报告。报告指出，这个新的安全体系需要对 3 个相互影响的因素进行良好构建：权力平衡、改革和多边主义。未来任何安全体系必须解决地区国家的内部政治变动、边界纠纷、可能出现的核扩散、过度靠单一产品所引起的经济不稳定。报告认为，建立这种新安全体系，需要关注两大主要问题，一是美国和伊朗关系，二是关注巴以和谈。尤其是只有美国和伊朗关系得到改善，安全体系才有可能进一步牢固，对美

¹ 新华社联合国 2008 年 1 月 7 日英文讯。

国来讲,才有可能以最低代价和风险获得更多的安全。欧洲的声音对未来海湾安全体系的建构也很重要,美国和欧盟需要在一系列问题上进行合作,从帮助建立一个新的伊拉克政权,到鼓励伊朗的适度改革和现代化。海湾新安全体系的建构也可以将美国、欧盟、联合国和俄罗斯四方作为一个有用的多边外交途径,但领导权必须来自美国和欧盟,因为它们有必要的军事、经济和外交资源和民主经验。¹

米谢尔·瑞恩·克雷格在《中东政策》2006年第1期发表了标题为《建立新海湾安全秩序》的文章。该文主张像东盟地区论坛、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一样建立一个海湾地区安全论坛(Gulf Regional Security Forum),其主要成员是南北海湾国家,在对话的基础上改善海湾地区安全环境,减少紧张状态,促进合作,反对跨界威胁。这种海湾合作还包括海湾邻国,比如阿富汗、土耳其、巴基斯坦。要取得长久稳定,还需要得到美国、欧洲、南亚和中国的支持。

美国外交学会中东问题副高级研究员瓦利·纳斯尔和外交学会高级研究员雷·塔基也在美国《外交》杂志2008年1~2月号上发表文章,建议美国纠正对伊朗的政策,建立中东和海湾新安全体系。他们指出,中东的重心已经从拉凡特地区转移到海湾,美国应该向一个新的地区安全体系前进,而不是使海湾军事化,并在伊朗周边地区支持遥遥欲坠的同盟。这个体系应该突出所有的地方参与者,并依赖于包括保证该地区各国边界不受侵犯的条约、禁止某种武器的武器控制协定、具有自由贸易区的共同市场和用于判决争端机制在内的一系列措施。主张与伊朗对话,因为伊朗和美国都希望伊拉克领土完整,并防止其内战吞噬中东。文章指出,“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最近一次团结阿拉伯世界遏制伊朗行动的最终结果是带来了一种激进的逊尼派政治文化,这种文化最后创造了基地组织。”今天遏制伊朗将意味着促进逊尼派极端主义——对华盛顿来说这是一个自我拆台的主张。对美国来说,新安全体系将以地区融合为目标,并培植一个新框架使一个稳定的现状对所有相关角色都存在利害关系,而不是把注意力放在恢复以前的权力天平上。^④

很明显,上述所有的安全方案都是建立在美国掌握领导权的基础上。但事实上,美国在中东和海湾地区的存在也是地区不稳定的因素之一,反美情绪已经成为中东地区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上该地区复杂的宗教、种族、领土纠纷等,要建立满足相关各方的安全需求并非易事。这是因为下列重要因素使然:

1. 美国和伊朗关系。美伊自1980年断交以来,尽管有人质疑两国的私下接触一直不断,而且在伊朗改革派上台时曾出现过两国和解的曙光,但要恢复断交28年的外交关系,两国既需要勇气,更需要时机。不管是因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建立的神权政治与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观背道而驰,还是因为人质事件使美国耿耿于怀,事实上,地区安全问题是美国与伊朗两国关系的主要症结。沙特《杂志周刊》曾评价说,伊朗和美国的争端同伊朗核计划无关,争的是对该地区的霸权,伊朗认为,该地区比信仰重要,只要能满足它控制中东并在该地区发挥最大作用的意愿,它不反对承认以色列,也不反对同它所谓的这个最大魔鬼结盟。^⑤当前,伊朗在安全问题上的态度也很明显。2007年2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萨法维将军指出:“伊朗这个伊斯兰强国在中东安全上有最大的发言权,美国如果不考虑伊朗的国家利益,就不可能在中东地区安全上实现任何改变。”“伊朗的军事和情报力量不仅可以保证本国的安全,还可以提供和保证中东地区的安全。”^⑥但要让美国和伊朗都有安全感并非易事。美国一直怀疑伊朗伊斯兰政权势力发展壮大威胁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伊朗则怀疑

¹ See Andrew Rathmell, Theodore Karasik, and David Gompert, “A New Persian Gulf Security System”, Rand, 2003.

^④ See Vali Nasr and Ray Takeyh, “The Costs of Containing Iran”,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8, <http://www.foreignaffairs.org/20080101faessay87106/vali-nasr-ray-takeyh/the-costs-of-containing-iran.html>.

^⑤ 参见 [沙特阿拉伯]《杂志周刊》,2008年1月26日。

^⑥ Mehran Karraza, “Iranian National-Security Debates: Factionalism and Lost Opportunities”, *Middle East Policy*, Vol. XV, No. 2, Summer 2007, p. 93.

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存在是挑战伊朗的地区地位和军事实力。这也是两国分明有广阔合作空间却长期对峙的原因。

2. 伊拉克问题。它在一定程度上浓缩了海湾安全的主要内容，如领土问题、什叶派与逊尼派的矛盾问题、库尔德问题、国内政治中温和派与激进派的关系，以及美国与海湾地区国家关系等问题。尽管目前伊朗和美国在伊拉克问题上已进行3轮会谈，但伊朗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美国稳定伊拉克局势仍未可知。一方面，这种进程在一定程度上靠美国和伊朗关系的改善；另一方面，对伊朗在伊拉克什叶派和库尔德集团中的传统影响不可高估。目前，什叶派是伊拉克重要的主政派之一，但事实上只有激进的什叶派与伊朗关系密切。伊拉克什叶派的最高精神领袖西斯塔尼虽然出生在伊朗，但他的治国理念与伊朗明显不同。霍梅尼主义是当代伊朗立国之基，它主张什叶派的政治行动主义，号召建立伊斯兰政权，教法学家权威治国。西斯塔尼则主张静默主义，不主张政治参与，但主张乌莱玛在公共和法律领域的积极活动。¹ 他也曾宣称，“我决不允许伊朗的经验在伊拉克被复制。”^④

3. 地区信任问题。长期以来的三角制衡，使海湾地区的国家关系大多建立在对抗和防范的基础上，这种安全模式的惯性，使海湾地区国家很难在短时间内形成以合作和信任为基础的集体认同。伊拉克战争后，伊朗什叶派势力大增，沙特等周边国家对“什叶派新月地带”的崛起感到恐慌。它们害怕出现下列情况：伊朗90%的什叶派，伊拉克65%、巴林60%、沙特富油的东部省份阿哈萨省50%的什叶派连成一片，从地理上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石油联邦斯坦，从而左右中东和海湾的政治格局。^④ 在伊朗核问题上，海湾国家也纷纷表示担忧，海合会秘书长阿提亚于2006年2月12日在阿布扎比举行的首脑会议上称，伊朗寻求核技术是对地区安全的威胁。沙特外交大臣沙特·费萨尔甚至认为，伊朗的行为可能引发使整个地区陷入灾难的事态发展。而阿联酋外交部长拉希德则警告人们当心核辐射可能对环境造成破坏，因为伊朗位于布什尔的核设施距离海湾国家比德黑兰还要近。^④ 为应对伊朗核计划可能带来的地区力量失衡，2007年，海合会成员国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也开始研究与商讨在海合会成员国内部实施核计划的可行性。

4. 美国未来对中东的政策。美国作为海湾地区安全的重要参与者，其未来的中东政策对该地区安全体系建构至关重要。当前，美国在经历伊拉克重建挫败后，它对中东的政策开始出现新趋向。尽管总统布什在2008年国情咨文中提到，在伊拉克问题上，“在打败敌人之前绝不罢手”，在伊朗问题上表明：“将打击那些对我军构成威胁的人”。但美国和伊朗在伊拉克问题上的接触和2007年12月出台的美国情报评估，使分析家们仍对美伊（朗）关系产生怀疑。沙特《杂志周刊》的一份报告强调，在任何情况下，德黑兰都不是美国真正要攻打的目标，目前两国之间按既定计划合作的趋势很明显。^⑤ 在伊拉克问题上，美国总统候选人对美国中东政策的构想和有关撤军伊拉克的争论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未来美国对中东的政策令各国拭目以待。

（责任编辑：樊小红 责任校对：詹世明）

¹ See Babak Rahimi “Ayatollah Ali al-Sistani and the Democratization of Post-Saddam Iraq”, *Middle Eas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 No 4 December 2004. p. 14.

^④ Maximilian Tetzlaff “Are the Shia Rising?”, *Middle East Policy*, Vol XIV, No 2 Summer 2007. p. 77.

^④ See Henner Furtig op. cit, p 635.

^④ 参见新华社柏林2006年2月7日德文讯。

^⑤ [沙特阿拉伯]《杂志周刊》，2008年1月26日。

Building A New Security System in the Gulf

— A View From Ahamadinejad' s Visit to Iraq

Jiang Zhen

pp. 5- 11

As two important states in the Gulf and Middle East, the engagement of Iran and Iraq seems that some new sectors are appearing concerning the security in this region, and some new powers are chasing the leading role to dominate the security Affairs in the Gulf. After the Iraq war, U. S., Iran, Iraq and Saudi Arabia have become the leading four states dominating the security affairs in the Gulf, and traditionally the later three Gulf states once kept the balance of Security in this region. After the failure of rebuilding a new Iraq replacing Saddam Hussein regime,

U. S. is going to the frontier from the curtain in dominating the security affairs in the Gulf. Now there are appearing a new security system coexisting of competition and compromise, and the leading security factor is forming. There are many difficulties in establishing a new security system in the Gulf, such as the relation between U. S. and Iran, the rebuilding Iraq and its stability, the issue of confidence in this region and the future of U. S. ' s foreign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On the Social Function of Islam Culture

Liu Yueqin

pp. 12- 18

Islam is generally described as a product of combination of religion and social revolution, and it really plays great role in adjusting and regulating social order. The social function of religion is the core element of religion identity and conception. Islam has special social function which includes the function of conformity, the function of engagement, the function of coordination. Those functions have important meanings for public lives and reflect the

“systemic statue” of political elements. The populace is the basis for supporting the regime, and the stability of regime depends on the stability of the populace. This paper here tries to analyze the role of Islam in forming early Islam society system, and its role of conformity of legality and social order; therefore it can truly reflect the social life situation within Muslims.

Turkish Nationalism and Modernization

— Ziya Gokalp and His “Metaphor” Nationalism

Zan Tao

pp. 19- 25

Ziya Gokalp is a famous theorist with great influence in Turkey. He described the following two tasks for Turkish nationalism: how to adhere to the identity of Turkish nation and how to graft Turkish culture into west culture so that to realize modernization. One content of Ziya Gokalp' s theory is to provide historic basis and legitimation for

Turkey to learn from west and realize materialization, through “rebuilding” a secular, positive Turkish national history and cultural tradition. The most important feature of this “Metaphor” nationalism is to idealize the past and to correspond the bright future to the glory past.